

書 評

李 偉 呈^{*}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The Space of Religion: Temple, State, and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440 pages. ISBN 9780231197359

Yoshiko Ashiwa（足羽與志子）和 David L. Wank（王達偉）教授的新書 *The Space of Religion: Temple, State, and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Modern China*（宗教空間：現代中國的寺廟、國家和佛教社群）是一本探討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宗教復興的著作。本書透過近三十年的田野和文獻整理，陳述了位於福建廈門的南普陀寺如何在 1979 年改革開放後，重新拾起過去的佛教遺產，並在海外華人、國家政策及官僚機構等勢力的相互作用下重新將南普陀寺打造成如今中國的佛教聖地的過程。

足羽與志子與王達偉目前分別任教於日本一橋及上智大學。兩人皆長期合作從事當代中國宗教全球化以及宗教政治的課題，並共同有許多著作。¹足羽與志子畢業於一橋大學社會學科，其指導教授為日本知名文化

2024 年 5 月 26 日收稿，2024 年 9 月 18 日修訂完成，2025 年 2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Li Wei-che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 在此列舉部分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eds., *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人類學者長島信弘，從事當代亞洲宗教（尤其是佛教）研究，並關注宗教如何在政治、社會結構的轉型中，不同族群、宗教、跨國網絡與國家、政策對抗、協調的交互影響。王達偉則為 Ezra F. Vogel（傅高義）的學生，承襲其對於東亞政治和經濟、消費市場以及共產主義的市場研究。著重於政治社會學中的社會領域制度變遷，並拓展至企業、佛教、經濟及跨國網絡如何形塑這種變遷過程。因此該書可謂是兩人結合所長合力完成的作品。

本書不含緒論及結論共分 9 章。在緒論中提到，中國自 1979 年改革開放後，迎來了許多城市的經濟起飛以及國家宗教政策的鬆綁所帶來的宗教復興。本書便是討論南普陀寺於 1979-2004 年期間的復興過程。本書視野是從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改革思潮為起點，注意到第二任住持太虛法師（1890-1947）將該寺打造成近代中國佛教改革基地的「遺產」，如何協助該寺於 1980 年後的復興。本書對於宗教與國家的論述上，否定了二元體制下的對抗、自主的路徑，而是注意到衝突與合作中更多的元素參與，包含價值觀、參與者、政策理解等。方法上，本書採用民族誌的書寫和歷史文獻研究的結合，概念上則是運用宗教空間的概念理解。

第 1 章是主題與概念，說明本書的定位、概念及目的。首先作者探討了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所歷經的兩個世俗化政權下的宗教政策，不論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試圖將宗教抽離，或是置於其民族國家建構的一環，這迫使宗教界必須因應政局。同時受到西方思潮、宗教的挑戰與現代化影響，當時佛教界也必須走向現代化的方向。其中南普陀寺因在當時的宗教地位不高，因此更能靈活的接受現代性的潮流（頁 27）。這包含於 1925 年成立的閩南佛學院，以及 1927 年太虛擔任住持期間所推動

Stat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The Politics of a Reviving Buddhist Temple: State, Association, and Religion in Southea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no. 2 (May 2006): 337-59;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Clergy and Devotee Network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 no. 2 (June 2005): 217-37.

的各項改革。之後受到戰爭與中共排斥宗教的政策影響，許多佛寺成員逃往海外，南普陀寺也被改建成工廠，直至 1979 年後才逐漸恢復。

概念上，作者將宗教區分成三種空間。物質空間（physical space）反映在寺廟的建築、格局、雕像、物品等實體事物上；符號空間（semiotic space）則是佛教中的教義和價值觀等，包含佛經、儀式、生活方式、宇宙觀等，並反映在物質空間中的裝飾品、藝術、碑刻上，給信徒帶來如臨佛教莊嚴、神聖的體驗。制度空間（institutional space）則是國家的憲法、政策、法律和指導方針等所塑造的空間。這包含中國嘗試將佛教納入國家體系的一部分，以及佛教本身如何適應這種制度空間。此外，本書亦有論及網絡及事件（episode）的影響，網絡包含寺廟如何與不同官員、海外華人建立聯繫的過程。事件則是各種空間交互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它昭示或改變了前述的網絡或是空間變動。

第2、3章則是介紹南普陀寺的物質、符號及制度空間。物質空間上，作者依序展示南普陀寺的寺廟格局，包含從前院的廣場到天王殿、中央的大雄寶殿，後院的大悲殿及倚靠的五老峰和相關建築、景觀。西院為寺廟僧侶等神職人員活動的場域，東院則是開放給觀光客、信徒的商業活動場域。其中，大雄寶殿雖是寺廟的核心，但最受信徒喜愛的是大悲殿的觀世音菩薩及後山的巨佛字。符號空間上，作者考察了散布佛寺內的對聯、雕刻、壁畫等，對聯間與佛教故事、寺廟歷史及教義的連結。但此處較可惜在於未能深入探討這些藝術表現如何被信徒接受的過程。

制度空間上，作者探討 1979 年後中國宗教政策的制定如何影響南普陀寺的發展。其中 1982 年所發表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稱 19 號文件）的思想聲明確定了共產黨的方向，並建立起各種行政機關層層管理宗教。這使得寺廟及地方政府能根據文件內容去理解並尋求擴張，或是不同機關藉此相互競爭。福建省政府便是藉由過去太虛倡導的人間佛教與社會主義結合，並用以復興南普陀寺，將之打造成連結海外華人、僧侶的樞紐，使得福建成為 1980 年代最早大規模復興佛寺的省份。

第 4 到第 6 章則是探討南普陀寺於 1979-2004 年的復興過程，本書將這段時間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82-1989 年，此階段中，南普陀寺開始建立培育佛教人員的課程與機構，在海外華人的大力支持下，1985 年建立閩南佛學院，並陸續引入現代化課程以及擴充佛寺的物質空間。第一任住持妙湛法師（1910-1995）主導了此時的宗教復興。但隨著復興過程帶來的龐大利益，廈門市民族與宗教事務局（簡稱廈門宗教局）與南普陀寺便展開管理及商業利益的鬥爭。同時 1989 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更使得官方開始將愛國愛教的價值觀引入佛學課程和管理寺廟遊客上。

第二階段為 1989-1995 年，此時中共逐漸要求宗教要能更好的為國家服務。此現象在 1989 年妙湛升任為住持的儀式上可見，此儀式是被作者認為三種空間和諧的一種展現（頁 152-159）。不過可惜之處在於作者未能針對這場儀式中官員的站位或布局進行討論，此方式應可見到更多制度空間如何影響符號空間的過程。隨著妙湛擔任住持後，開始要求重新取回商業設施的管理權與廈門宗教局鬥爭，這使得雙方爆發更進一步的衝突，最終妙湛透過將中國佛教會的勢力引入後取得短暫勝利，卻也造成後續中央直接介入佛寺核心的問題。

最後階段則是妙湛往生後，南普陀寺於 1995-2004 年逐漸與中央政策一致的過程。1990 年代開始，中國推翻過去 19 號文件的方針，轉以更積極的方式將宗教納入民族統一戰線的陣容中，其中改革開放後的第二任住持聖輝法師（1951-）便是其中代表。比起妙湛重視佛教界的自主，聖輝對於中國控制宗教的態度和意識形態更能適應與合作。他重新調整了三種空間的組成，並選擇不介入廈門佛教會與廈門市宗教局的長期鬥爭中。聖輝透過更為嚴謹的紀律管理，將閩南佛學院打造成享譽全國的教學單位。透過標準化的方式，排除了過往當地儀式服務的宗教實踐，其結果便是使得南普陀寺與國家期望一致，卻也使得佛寺與當地信徒、廈門當地佛教團體的關係脫離。

第 7 到第 9 章則是討論南普陀寺與當地社會，包含與其他佛教社群、信徒以及觀音節的關係。第 7 章作者將焦點放在廈門當地的佛寺，其中作

為南普陀寺分院的鴻山寺住持法雲將廈門的佛教傳統與愛國敘事、本土資源連結，最終將該寺打造成當代文化及藝術中心。普光寺則是承接了南普陀寺釋出的儀式需求，並在經營上與 19 號文件價值觀媒合，使之成為財富累積相當成功的佛寺之一。虎溪巖寺因其歷史以及優美環境成為當地的信徒中心，但同樣捲入廈門佛教協會與宗教管理局的鬥爭中，最終由南普陀寺藉由傳法的方式將該寺住持提升地位，使之具有足夠資本與地方機構對抗。白鹿洞寺則是因其對於閩南語和文化的堅持，使之與地方官員、富商關係密切。其他三座寺廟則是展現宗教空間的彈性。諸如萬石巖寺、觀音寺及天柱巖都是在國家政策下靈活運用各種資源所展現活力的經典案例。

第 8 章則是討論僧侶之外的兩種佛教修行者：居士和菜姑在閩南佛教的復興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與南普陀寺的關係。諸如林子青（1910-2002）等居士信徒，他們早年受過完整的佛學教育，並在 1979 年後成為閩南佛教復興的重要成員。但隨著閩南佛學院等機構成立，以及國家政策方向的轉變後，他們便被疏離和禁止。至於閩南一帶盛行齋堂信仰與菜姑，其特殊的宗教定位在國家政策和佛學院的影響下，許多齋堂皆空門化，或是被改建成文化中心。

第 9 章則是講述觀音節如何成為一個場域，並連結信徒與南普陀寺，成為地方宗教活力的重要資本。由於觀音節本身帶有民間信仰的性質，如何將其定位成為了一項課題。作者透過詳盡的科儀整理注意到，該儀式藉由物質空間的操作使之框定在寺院中行為皆是佛教的想像，同時也注意到信徒理解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思維轉換。

前述提及，本書對於國家與宗教的互動上基本上駁斥了壓抑與自主的二元觀點，而是試圖提出適應與變動的角度去看待佛教如何適應國家壓力的過程。作者在書中透過妙湛與廈門市宗教局的鬥爭，以及聖輝如何與國家政策合作的角度看待歷史行動者決策對於宗教空間的變動。但其中值得思考之處為宗教適應程度及範圍的問題。諸如 Ji Zhe（汲喆）等人對於後毛時期的宗教復興討論中，面對一個標榜無神論意識型態的政權，各方

（包含地方宗教管理局、佛寺等）必須保護自己的合法性利益，但同時又試圖在宗教復興的浪潮中把握機會，也必須要符合中國文化的傳承目標，因此各方的談判與協調成為了此時佛教復興的重要內容。²從這角度看待妙湛與聖輝的態度，妙湛與官方的抵抗或衝突多是在地方宗教管理局和相關單位，原則上並未違反中央的準則，當衝突上升至國家層級時，基本上只有順從或是因應的態度。³

至於聖輝法師，並未承襲過往二十世紀初佛教改革的佛學教育，而是由紅旗下的法輪單位所培育的僧人。就任住持時正處於國家宗教方針的轉變。因此當在看待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時，基本上宗教的自主性仍是在國家賦予的制度空間下才能有所因應，從如今的南普陀寺來看，面對政治也僅能將符號空間不斷壓縮作為回應。

另外，本書論及宗教復興的過程中，特別強調太虛在二十世紀初一系列人間佛教的改革內容如何成為「遺產」，並用以復興南普陀寺。在這個課題上，個人認為可以重新回到這些遺產本身以及使用這些遺產的人來思考。諸如 Jan Kiely（楊凱里）、Raoul Birnbaum（歐陽瑞）、Ester Bianchi（黃曉星）等學者對近代中國佛教菁英的討論，⁴均涉及到近代中國佛教重要人物生前的言行及其改革內容在他們往生後如何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使之「成聖」（“saint making”）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所帶來的遺產，部分是基於國家需要而重新定位、使用，更多的是他們生前有意的保留，並且這些保留的遺產又受到其弟子或是在 1980 年代的宗教復興需求上不斷被提煉和採用。

這點可以回到太虛當年到南普陀寺擔任住持的經驗觀察。1927 年夏，南普陀寺會泉、轉逢、轉岸、常惺四僧禮請太虛出任住持，以及閩南佛學

2 Ji Zhe, Gareth Fisher, and André Laliberté, eds., *Buddhism after Mao: Negotiations, Continuities, and Reinven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21-44.

3 書中便有討論當時北京當局發生諸如天安門等政治事件後，妙湛如何設法阻止閩南佛學院的學生前往北京聲援的內容。

4 David Ownby, Vincent Goossaert, and Ji Zhe, eds., *Making Saints in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0-77, 161-208, 272-311.

院院長。太虛雖身任二職，但主持數月後便赴歐美各地弘法，⁵ 由轉逢、覺三代理住持。⁶ 1929 年冬才回福建，隔年任期屆滿後，又任住持 3 年。數月後，又到四川、北平各地講學，寺務由大醒、覺斌代理，學院則由芝峰代理，直到 1933 年春才又回閩處理寺務與學務。太虛名義上雖主持寺、院 6 年，但真正親理時間不到 1 年，這便使得本書所言之太虛遺產有了更多討論空間。所以說，太虛於 1927 年到南普陀寺擔任住持及其改革內容，在如今的南普陀寺中成為了其宗教空間的重要成分。但太虛如何保留了這些遺產，又或是寺方在復興過程中如何汲取這些遺產並重新詮釋，成為本書討論中可以再展開的重要問題。

接著，當時的中國佛教會長趙樸初（1907-2000）時常在公開場合稱其為太虛的重要繼承人，但實際上趙樸初與太虛並未有交集，其佛學教育是承襲圓瑛法師（1878-1953）等人的上海佛教團體，而圓瑛與太虛的關係並不融洽。換言之，趙樸初也是重新汲取了太虛遺產並重新詮釋，並且太虛的人間淨土內容也符合中共對於佛教的指導方針，值得再深入思考。

這點可以從 1980 年代初茗山法師（1914-2001）參與中國佛教協會籌辦工作時，與趙樸初的會談中可以看到。1980 年 11 月 3 日上午，於北京舉辦中佛協籌備會議時，趙樸初嘗言協辦政府工作有三：「1. 協助政府貫徹宗教政策；2. 恢復佛教學術研究和培育人才；3. 展開國際佛教徒的友好合作。」⁷ 這比本書中 1982 年中共所發表的 19 號文件時間還早兩年。因此，1985 年閩南佛學院的復辦以及趙樸初宣稱他是「太虛的重要繼承人」等事情結合。可以看到本書所言的制度空間以及打造的太虛遺產實際上就是形塑南普陀寺復興的主要力量之一。

最後的 7-9 章，提及閩南當地佛寺因相關資源有限，必須更靈活地面對政府的壓力。如第 7 章中半山土地公轉變成佛寺的討論，第 8 章中齋堂模糊且特殊的位置使得許多齋堂會加入佛教，最終造成空門化的結果。及

5 慮愚、寄塵合編，《廈門南普陀寺志》（出版地不詳：南普陀寺，1933），頁 88-89。

6 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2 輯 第 8 冊：廈門南普陀寺志》（臺北：明文書局，1994），頁 94、103。

7 釋茗山著，許鈞整理，《茗山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11-112。

第 9 章的觀音節中，寺方為因應該節慶的民間信仰（迷信）質疑，透過宗教空間的使用，將民間信仰儀式轉變成佛教的儀式。這似乎顯示了一個不只中國，包含臺灣、東南亞等華人為主地區的共同現象，便是民間信仰的佛教化，或是齋堂的空門化問題。這個課題是一個當代的趨勢，但涉及的原因和過程卻相當複雜。以臺灣而言，齋堂空門化始於日治時期日本佛教教派傳入臺灣，以及寺廟登記的政策下逐漸導致的結果。⁸ 東南亞可能涉及到過往齋堂作為移民社會相互照應的社會功能逐漸失去，加上被認定成佛教對於發展有更多助益，推波助瀾下的現象。⁹ 至於中國，同樣也是因應制度空間下的結果，齋堂或部分寺廟空門化可能是基於在佛教的保護傘下，各種宗教活動得以被認定成佛教活動。這與臺灣有相似的發展，但在時間上卻有所差異。有趣的是，從本書的案例中又可以看到佛教試圖減少宗教成分，更強調其作為傳統風俗、文化的內容，而這種適應可能也符合中共將宗教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方針。換言之，本書提出的三種空間架構，並非是單純的一概而論，仍需要針對不同事件或時空下所呈現出的三種空間交互結果進行思考。

綜上所述，本書透過南普陀寺及周邊佛教的內容重新思考了二十世紀以來宗教改革思潮，以及宗教與政治關係。這種討論確實可以看到地方佛

8 參見王見川、李世偉著，《臺灣的寺廟與齋堂》（臺北：博揚文化，2004）；闕正宗，〈齋教先天派乾元堂係在北臺灣的發展〉，收入氏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揚文化，2014），頁 213-234；李玉珍，〈女齋堂空門化的契機——從齋姑到比丘尼修行方式的轉變〉，收入趙文宗、劉宇光編《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香港：圓桌文化，2012），頁 66-105；林淑鈴、張二文、鍾鳳娣，〈從齋堂到佛寺：以六堆客家地區為例〉，《臺灣宗教研究》20:2(2021 年 12 月): 107-156。

9 在此課題上，蘇芸若透過東南亞華人地區的齋堂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參見蘇芸若，〈馬來西亞柔佛州南部先天道齋堂調查〉，《田野與文獻》90(2018 年 4 月): 1-7；蘇芸若，〈獅城善女人——19 世紀以來的新加坡齋姑社群〉，《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5(2020 年 6 月): 122-183；Show Ying Ruo, “The Blooming of the Azure Lotus in the South Sea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Indigenous Scriptures in Buddhist Vegetarian Halls of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48, no. 2 (December 2020): 233-84；Show Ying Ruo, “Virtuous Women on the Move: Minnan 閩南 Vegetarian Women (caigu 菜姑) and Chinese Buddhism in Twentieth-Century Singapore,” *華人宗教研究* 17 (March 2021): 125-81.

教單位如何巧妙的採取各種策略來因應不斷變化的政治局勢，希冀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的個案研究，進一步從地方的角度重新思考二十世紀初的佛教改革內容，因戰後中共政治運動造成看似中斷的局面，卻在 1979 年後呈現出某種連續性和活力的課題，本書皆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討論。